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一百零三期
2025年5月　　頁 1 ~ 4 0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505_(103).01

# 重探「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簡　逸　光**

## 摘　要

陳淳錄「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為朱子歿後弟子爭議的問題之一，黃榦一開始便質疑此非朱子之意。近來不少學者對此問題重新探究，不過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原因在於對「四子」的理解不同，或曰《四書》，或以為北宋四子。從語錄的角度檢視陳淳的記錄，亦能在朱子著作中找到相同的意思，故這句話應最大程度的優先以陳淳的解釋為第一義。二人意見分歧的關鍵在於黃榦強調《大學》是入學基礎，不可更易；陳淳認為欲解孔孟不傳之秘旨，當從北宋四子為鎖鑰窺測其蘊，則《近思錄》乃是入道方法。如此看方能釐清黃榦與陳淳的爭議，也才能真正理解朱子對初學入道的看法。而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正是以入道之法注入學之書的集大成者。

關鍵詞：陳淳　黃榦　近思錄　四書章句集注

2024.03.13 收稿，2025.01.16 通過刊登。
* 本文為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正誼堂全書・二程粹言》的整理與研究」（FJ2024JDZ023）階段性成果。承蒙兩位審查先生惠賜寶貴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謹此誌謝。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Email: chienik@qq.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Reexamining "the *Jinsilu* as the Ladder to the *Four Books*"

Chien, I-kuang *

## Abstract

Following Zhu Xi's death, his statement, "The *Four Books* serve as the ladder to the Six Classics; the *Jinsilu*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serves as the ladder to the *Four Books*," as recorded by Chen Chun, led to considerable dispute among his students. Huang Gan, for instance, expressed doubts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u's statement and argued that it did not align with Zh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recent years, numerous scholars have revisited this issue; however, interpretations remain diverse and inconclusive, primarily due to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ih xih (四子)"—some equate it with *The Four Books*, while others associate it with the Four Masters of the Northern Song. While Zhu's statement was recorded as a quote in Chen's writing, similar ideas can be found in Zhu's other works; therefore, Che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ote should be seen a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valid argument regarding Zhu's thought. Moreover, the divergent views between Chen and Huang stem from Huang's emphasis on the *Great Learning* (*Daxue*) as the foundation and unshakable principle for the path to academic Confucianism. Chen, however, contended tha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uzzle of long periods without Confucius-Mencius sages should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wisdom apprehended by the Four Masters; additionally, the *Jinsilu*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which serves as the access to the Way. Asserting that Zhu's *Four Books of Notes to Sentences* re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that features both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and academic Confucianism,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disputes between Chen and Huang as attempt to bring insight in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Zhu's views on the beginner's Confucian approach to the Way.

**Keywords:** Zhu Xi, Chen Chun, Huang Gan, *Jinsilu*

*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hienik@qq.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一、引言

朱子（1130-1200）歿後，弟子對於如何將老師的德行、學問傳之後世煞費苦心。為了「盡善盡美」[1]的完成此事，弟子間的意見交流甚為直接，如黃榦（1152-1221）執筆撰寫〈朱子行狀〉，起稿徵求諸方意見，陳淳（1159-1223）云：「鋪敘得大意頗出甚穩帖，然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安處……云『正統有歸』，恐只宜作『全體有在』，又如『秋霜』處尚欠溫和一節，又如『有功天下後世』處，恐欠集諸儒大成底意……恐不必如是，分開了，失其旨矣」。[2]對黃榦的遣詞措意字斟句酌，嚴肅且謹慎，唯恐言語有毫釐之失。又如在門人弟子集結朱子生前的語錄中，有一則「《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3]之階梯」，這段文字為陳淳所錄，收錄初始黃榦即提出質疑。一位是朱子易簀前一日去書云：「吾道之托在此者，吾無憾矣」，[4]一位是朱子讚賞有加之人，朱子曾云：「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皆未有及之者……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5]都是朱子看重的高足。若僅看二人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言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黃榦與陳淳二人是否在爭奪朱門「正統」的位置，[6]

1 陳淳讀黃榦撰〈朱子行狀〉初稿，對遣詞用字及概述朱子學問處均提出商榷意見，末云：「凡此等恐更當修刮，純粹無病，方為盡善盡美」。參見宋・陳淳，〈與朱寺正敬之二〉，《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 23，《宋集珍本叢刊》第 70 冊（北京：綫裝書局，2004，據明鈔本影印），頁 3b。

2 同上註，頁 3a-頁 3b。

3 本文中「四子」一詞，凡指《四書》者加書名號，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四子者不加標點符號以別之。

4 宋・朱熹，〈與黃直卿書〉，《晦菴先生文集》，卷 29，《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據宋刻本影印），頁 33a。

5 宋・朱熹，〈與李唐咨書〉，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 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4a。另見《宋史》云：「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參見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430，頁 12788。又如全祖望云：「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為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參見明・黃宗羲原本，清・黃百家纂輯，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卷 68，明・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 9 冊，頁 2507。

6 近代學者論黃榦、陳淳二人關係，常以正統觀點論之，如李紀祥云：「牽涉到對師門兩部大書……關於道統、入道之序的看法之歧」。參見李紀祥，〈入道之序，由「陳（淳）、黃（榦）之歧」到李滉《聖學十圖》〉，《道學與儒林》（臺北：唐山出版社，2004），頁 103。此文是近代第一篇深入討論黃榦、陳淳關於道統、入道之序的看法之歧的學術論文，引發後來學者追問「四子」為何，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學術議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其實二人私交甚篤，[7]於此論事求好心切，當是為了不負作為朱子門人的責任與擔當。

朱子身後，為世人所重，隨著影響力不斷提高，凡為新刊《近思錄》撰序或編纂朱子年譜者，常會引到此段文字，並載明為朱子所言。另外在流傳過程中，因後人對「四子」的理解不同，衍生出不同解讀與看法。本文透過梳理此段文字的出現、爭議，藉此說明流傳過程產生分歧的原因與清代學術風氣轉變對《近思錄》作為入道之書的影響。

## 二、爭議的開端

《朱子語類》[8]收錄陳淳記載朱子教誨，云：

>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9]

---

又如《泉州府志》云蔡和、陳淳影響地方學子，時云「紫陽別宗」。參見明・陽思謙修，明・徐敏學、吳維新纂，《萬曆重修泉州府志》，卷 17，劉兆佑主編，《中國史學叢書三編》第 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據明萬曆 40 年刊本影印），頁 27b。張加才、李蕙如據《泉州府志》記載，均提到黃榦被視為得朱子之正統，因此陳淳一系被稱為「紫陽別宗」。參見張加才，《詮釋與建構——陳淳與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181。李蕙如，《陳淳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4），頁 2。

7 朱子歿後，陳淳頗憂師道不傳，曾致書黃榦抒發憂心，文中對黃榦云：「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惟吾兄是賴……使師道之湮傳，得以有光。」參見宋・陳淳，〈與黃寺丞直卿〉，《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 23，頁 1b。陳淳嚴謹不輕許人，信中文詞懇切非客套應酬語，二人交誼可見一般。

8 檢黃榦、陳淳的生卒年，爾等討論陳淳所記的文本當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李道傳編《朱子語錄》。不過李道傳本並未完整流傳，所以本文採用南宋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黎書是在李道傳《朱子語錄》，還有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黃士毅《眉州刊朱子語類》、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李性傳《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南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蔡抗《饒州刊朱子語後錄》、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年（1252）王佖《徽州刊朱子語續類》、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吳堅《建州刊朱子語別錄》等基礎上完善，是目前流傳較廣影響力較大的版本。

9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近思錄》，《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 7 冊，卷 105，頁 2629。案王星賢點校「四子」標示書名號，朱傑人等點校未標書名號，作「《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文提到為學次第，以《近思錄》為第一階，《四子》為第二階，六經為第三階。一般情況下語錄為弟子記錄師說，不過同是朱子高足的黃榦對陳淳的記載有所疑義，黃榦云：

> 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為先者，特以為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如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10]

黃榦就真德秀（1178-1235）刊《近思錄》所附〈後語〉中引到陳淳這段話，認為就初學次第而言，《近思錄》不當在《大學》（《四書》）之前，且云不曾見朱子著作中提過此語，故表示這不是朱子的意思。黃榦於此並無意貶低《近思錄》的意思，其曾云：「《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真可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11]其自然理解朱子編纂《近思錄》的重要性。

黃榦在朱子弟子中有較高的地位，不僅是朱子高足同時也是朱子的女婿，[12]全祖望（1705-1755）曾云：「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為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峰、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13]因為身分特殊，加上資質亦受朱子肯定，因此其作為判定某是否為朱子所云有一定的權威。如黃震（1213-1280）云：

---

之階梯」。參見宋・朱熹，《近思錄》，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5，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新訂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第 18 冊，頁 3703。

10 宋・黃榦，〈答李方子〉，《勉齋集》，卷 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7b-頁 18a。

11 宋・黃榦，〈與鄭成叔書〉，《勉齋集》，卷 9，頁 2b。

12 黃宗羲：「黃榦，字直卿，閩縣人……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參見明・黃宗羲原本，清・黃百家纂輯，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卷 63，頁 2259。

13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真公刊《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14]

又如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李道傳（1170-1217）編輯《朱子語錄》，請黃榦撰序，序云：

> 晦庵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於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遊者亦樂為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遊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讎校，重複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為卷帙次第，凡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於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後之學者，誠能齋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眾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鋟諸木，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榦謹書。[15]

黃榦對於朱子歿後門人弟子私下所作筆記相繼整理刊行頗為擔憂，因為傳抄過程難免訛誤，加上弟子領會有別亦無法確保其能夠真正傳達朱子原意。據李性傳（?-?）云黃榦撰此序後，又去信李道傳表達不滿，謂不可以隨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述之書。[16]是以作為這樣的一位核心弟子，黃榦似乎責無旁貸地須扮演一位糾察者的角色，以維持朱子學的正統。

---

14 宋・黃震，〈讀諸儒書八〉，《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正德刊本），卷 40，頁 22a。

15 宋・黃榦，〈書晦庵先生語錄〉，《勉齋集》，卷 22，頁 6b-頁 7a。此文亦收入《朱子語類》，題名〈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內容略有差異，作「又與潘時舉、葉賀孫諸嘗從游於先生之門者……隨其所得為卷帙次第，凡三十有三家」。參見宋・黃榦，〈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新訂朱子全書》第 19 冊，頁 4651。

16 宋・李性傳，〈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後序〉，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 1 冊，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實，陳淳著作中論讀書次第時亦曾引過程頤（1033-1107）以《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的說法，並表同意，故知以《大學》為初學入門之書基本上是朱門弟子普遍的共識。其云：

>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實群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17]

陳淳在此表達《大學》為學者必由是而學的入徑。再看陳淳問朱子讀書：

>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卻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淳[18]

陳淳記下朱子答覆專看一書以《大學》為先，所以陳淳必然清楚知道朱子以《大學》為先的說法。再看陳淳回復陳伯澡（?-?）云：

> 聖門事業浩博無疆，而用功有節目，讀書有次序。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此書見得古人規模節序；在諸書中，為提綱振領處必先從事於此，而《論》、《孟》次之，《中庸》又次之；《四書》皆通，然後胸中權衡尺度分明，輕重長短毫髮不差，乃可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於是乎井井繩繩，莫不各有條理而不紊矣。[19]

信中陳淳亦明確表示初學以《大學》為先。

那麼陳淳為何會有「《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之說呢？從陳淳和朱子的書信往來，可以看到二人論學的方式既深且細，再看《朱子語類》中陳淳

17 宋・陳淳著，〈讀書次第〉，熊國禎點校，《北溪字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78-79。

18 宋・朱熹，〈綱領〉，《朱子語類》，卷 15，《新訂朱子全書》第 15 冊，頁 452。

19 宋・陳淳，〈答陳伯澡三〉，《北溪大全集》，卷 26，頁 3。明鈔本「功」作「工」；無「在諸書中」四字。參見宋・陳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 26，頁 2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錄朱子答問達 537 條，可知陳淳是有意識並且認真的在記錄老師的教誨。另一方面陳淳的思想啟蒙與學術轉折關鍵在《近思錄》，其「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乃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20]故朱子若提過《近思錄》為四子階梯的說法必然會令陳淳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陳淳記錄此語應當是親聞朱子訓誨所記。

然而後世學者對句中「四子」，有以為其所指乃北宋四子者。因為朱子〈近思錄後序〉曾云此書：「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21]如李紀祥云：

> 在這篇文字中，朱子說得非常明確，《近思錄》是一部入門書，「得其門而入」的「其門」，明確指的即是北宋四君子。[22]

朱子編《近思錄》確實有作為入門書之意，且《近思錄》有導引後學自學的目的。在此語境下理解「四子」為北宋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二程等四位，於理亦通。不過理解陳淳所錄這句話不能從朱子〈近思錄後序〉來解釋，因為朱子當時並未提出以《近思錄》作為《四書》階梯的相關論述，故「《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應是後來才提出的。

檢視陳淳相關言說，可知陳淳所言的「四子」當指《四書》，並非北宋四子。見〈書李推近思錄跋後〉云：

> 某竊詳此跋意甚平正，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此自無可疑者。而子武乃不以為然，蓋緣跋中大意固正而行文語脈紆緩，發揮本旨未甚相照應，不見此編與《四書》相關切之處，遂有以啟其疑云耳。大抵聖賢示人入德，所以為理義之要者，莫要於《四書》，但絕學失傳，寥寥千載，直至四先生而後明。而四先生平日抽關啟鑰，所以講明孔、孟精微嚴密之旨者，又雜見於諸書，不可類考。幸吾先生輯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為此篇，其次第做《大學》，其會趣準《中庸》，其規模效《語》、《孟》，誠後學迷途之指南，而入聖門之正路也。

20 元・脫脫，《宋史》，卷 430，頁 12788。

21 宋・朱熹，〈近思錄後序〉，《朱子語類》，《新訂朱子全書》第 14 冊，頁 167。

22 李紀祥，〈《近思》之「錄」與《傳習》之「錄」〉，《道學與儒林》，頁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故吾先生所以發明《四書》之宏綱大義者，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編其四先生之要旨萃焉，欲起學者於俗學橫流之中，若不先考乎此，則準的不立，而邪正之分不明，聖門將何從而入？而千載不傳之秘旨，又將若何而窺測之？[23]

陳淳於此將《近思錄》與《四書》對舉，說明先讀《近思錄》的原因在於孔孟微旨失傳，有賴北宋四子啟鑰，而北宋四子微言散見，端賴朱子擇而輯之使之可讀。故先《近思錄》後《四書》之意甚明白。

再檢陳淳〈答李公晦三〉：

> 所示《近思錄》并林子武之說，良荷啟益。按此跋意自平正於理無咈者。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四子》之階梯」，今子武不以為然，乃欲讀《四書》，只參考此《錄》，使互得以發明。似此言者，彼只據先生已解之《四書》，理義已明白者而云云爾。若據古《四書》本文，非先有得乎此錄四先生之說，則亦將從何而入？而孔孟所不傳之秘旨，亦將從何而窺測其蘊乎？況先生所解《四書》之說，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錄》則四先生之要言所萃，今令學者先讀之，使知道統之復續，實有賴於四先生，而起尊敬師慕之心，然後循序漸進於孔孟之門，自當不迷，其所趨亦何疑乎？[24]

此處陳淳認為朱子之所以能突破漢唐注疏之學實受周敦頤、張載、二程的影響，如果唯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捨去對北宋四子的瞭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就一般讀者而言，光據古《四書》本文仍無法上承孔孟道統，因此在《四書》之前，應先學習《近思錄》，惟有先學會讀聖典的方法，才能真正讀懂聖人著述《四書》的本意。另外，陳淳寫給梁伯翔（?-?）的一封信裡提到階梯說，直接以《四書》替代「四子」，其云：

> 讀書次序亦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有條理，實群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

23 宋・陳淳，〈書李推近思錄跋後〉，《北溪大全集》，卷 14，頁 7a-頁 8a。
24 宋・陳淳，〈答李公晦三〉，《北溪大全集》，卷 23，頁 7a-頁 8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而胸中之權衡一定矣。至是乃可以進讀他經，併及諸史子，而論天下之事，無往不迎刃而解矣。若所謂《近思錄》者，又《四書》之階梯也，諸先覺君子發洙泗千載不傳之秘，其全編大帙，若遺書等類，文字浩博，難驟得其門而入。文公集其要者為此《錄》，真迷途之指南，而初學啟蒙之最切者。[25]

以上皆可證明陳淳所謂「四子」實指《四書》。

黃榦與陳淳的爭議在於《近思錄》是否為讀《四書》之前的初讀之書。王志瑋認為黃榦從經學體系來說不會同意《近思錄》在《大學》之前，其云：

> 至於《近思錄》定位方面，黃榦則是從《四書》經學體系去論斷《近思錄》不當在《大學》之前，但若就讀書方法來說，則亦同意陳淳的說法。……至於陳淳，則是透過北宋四子理學的脈絡，強調宋儒道統傳承意涵，因而對於《近思錄》的定位，將之作為《四子》之階梯。故在脈絡上，一個為朱熹之經學脈絡，一個為朱熹之理學建構，因而有所不同。[26]

王志瑋從經學與理學體系說明黃榦與陳淳的差異。提到陳淳，說陳淳是「透過北宋四子理學的脈絡，強調宋儒道統傳承意涵，因而對於《近思錄》的定位，將之作為《四子》之階梯」。筆者並不反對從兩種脈絡來討論朱子《近思錄》的學術定位，關鍵在於將此論點放回黃榦與陳淳的時空會產生一個問題，彷彿朱子的學術為何，乃徑由黃榦與陳淳自行為其老師進行學術建構，並在學術脈絡上為《近思錄》定位。筆者的意思是黃榦與陳淳當然可以透過自己的認識來判斷朱子的入道之門有不同路線，但前提應是從他們如何理解朱子的學問來進行論證，不宜將弟子形塑成從某特定目的來論斷朱子，畢竟弟子面對他們的老師朱子時存在最真切的情感，而不是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來標舉朱子。若如此言之，不但否定陳淳作為一位朱子器重的弟子在記錄師說上的可信度，也將階梯說直接指為陳淳所發明。

25 宋・陳淳，〈答梁伯翔一〉，《北溪大全集》，卷 30，頁 7a-頁 7b。

26 王志瑋，《黃榦、陳淳對朱學的繼承與發展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逢源先生指導，2009），頁 1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朱子而言，北宋四子是上承經學的階梯，途徑是一以貫之的。如同《童蒙須知》、《小學》也是階梯，它是相對於《近思錄》與《四書》的階梯；而就六經與《四書》而言，《四書》是階梯；就《四書》與《近思錄》而言，《近思錄》是階梯。

從陳淳〈答李公晦三〉與〈書李推近思錄跋後〉這兩封信可以發現，陳淳應是受到質疑才特意進一步將《近思錄》和北宋四子、《四書》間的關係加以說明。不過在這兩封書信中陳淳並不是以朱子說的話作佐證，而是以解釋朱子為何編《近思錄》的用意來強調北宋四子在道統上的重要性，所以無法直接證明朱子曾經有這樣的表述。在此朱子所傳的初學入道之門分為兩條路線，一為黃榦說；一為陳淳說。

在黃榦與陳淳的爭論過程，有一點值得注意。二人並非當面交換意見，而是分別透過第三人表達意見，二人均將己見傳達給同是朱子門人的李方子（1169-1223）。從黃榦、陳淳與李方子書信往來推測此段公案的來龍去脈，首先陳淳將此段記載提供給《語錄》的編者，真德秀看到了。所以後來真德秀刊《近思錄》時，〈後語〉中提到此段文字。另一位弟子李方子也看到了。然而李方子自己或不曾聽聞夫子提過，或在朱子門人弟子中聽到不同聲音，為了編纂朱子年譜，遂去信詢問黃榦、陳淳，故有黃榦答李方子書，陳淳答李公晦書。最後李方子接受了陳淳所記錄的是朱子的教誨，在其所編《紫陽文公先生年譜》採用了此段文字。[27]但其並非完全接受陳淳對這段話的解釋，詳見次節。

黃榦一開始從真德秀〈後語〉得知此事即不表同意，一直到晚年定稿的〈朱子行狀〉中仍明確強調朱子入道之序以《大學》為先，其云：

>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28]

黃榦撰〈朱子行狀〉是嘉定二年（1209）受朱子之子朱在所託，初始不敢下筆，待一、二年後才開始撰寫，言稱草稿，至嘉定十年（1217）完成定稿但未公佈，

27 宋・李方子原編，明・李默，朱河訂，《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卷 1，《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第 25 冊，頁 16a。

28 宋・黃榦，〈朱先生行狀〉，《勉齋集》，卷 36，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四年嘉定十四年（1221）因身體有恙才予以公開。[29]據此可知，自始至終黃榦以《大學》為朱子入道之序的觀點未曾改變。且這段內容似乎有意針對陳淳所錄「《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的說法，遂強調朱子承繼程子之說，把朱子引程夫子教人法以先生之名述之。原文為「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30]行文作「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31]於是以《大學》為先，可謂為黃榦對朱子入道之序的定論。

## 三、後世的引用與詮解

關於陳淳記載的這段文字，從後世接受情形來看，有同黃榦一樣提出質疑的，如林子武（?-?）云「不以為然」，[32]王懋竑（1668-1741）云：「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33]也有部分引用略去後一句的，如黃仲元（1231-1312）云：「《論》、《孟》，六經之階梯」、[34]何喬新（1427-1502）云：「《四書》之精詳，為六經之階梯」、[35]汪克寬（1304-1372）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36]等。也有不少是接受的，爾等直接於著作中引用，默認此語為朱子所說，亦有認為此說是朱子從個人的學習研究實踐中得出。[37]凡此等等，不盡相同。

29 參見宋・黃榦，《勉齋集》，卷 39，頁 22a-頁 23a。

30 宋・朱熹，〈書臨漳所刊四子後〉，《晦菴先生文集》，卷 82，頁 34a-頁 35a。

31 宋・黃榦，〈朱先生行狀〉，《勉齋集》，卷 36，頁 44。

32 陳淳寫給李公晦的兩封書信中皆提到子武「不以為然」。參見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 14，頁 7a-8b；卷 23，頁 7a-頁 8a。

33 清・王懋竑纂訂，《朱子年譜考異》，卷 2，《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8 冊，頁 1b。

34 宋・黃仲元，《四如講稿》，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0a。

35 明・何喬新，〈道統〉，《椒邱文集》，卷 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2a。

36 元・汪克寬，〈重訂四書集釋序〉，《環谷集》，卷 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7a。

37 程水龍云：「朱熹編輯《近思錄》之前的那個階段，是他一生中對北宋儒學著作的整理相對集中的階段，朱子從個人的學習研究實踐中得出，『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參見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嚴佐之先生指導，2006），頁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另外，朱子以「四子」表《四書》，[38]但提到北宋四先生時或稱四君子或稱四子，[39]導致後世學者對「四子」的解釋不一，形成不同的說法，部分學者為了更直觀的表達意思徑改文字，產生了新的異文文本。

綜觀後世引用此文，主要為《朱子語錄》、《朱子年譜》、《近思錄》三種著作，及根據三種著作進行重刊、修訂、重編、續補等衍生的相關文獻。其中《朱子語錄》將陳淳這段話選錄進去，在相關著作中並未體現出不同意見。在《朱子年譜》方面，最早為朱子編纂年譜的人是李方子，《年譜》在朱子四十六歲與呂祖謙（1137-1181）編《近思錄》底下注云：

> 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40]

此段注說多為後來為朱子修譜者繼承性抄入的句子。且李方子在《年譜》中直云：「朱子嘗語學者曰……」，若非對此公案有過瞭解，讀者或以為此語為李方子親聞夫子言教，是以後世編譜者幾乎沒有人對這段話有疑義，唯一一位提出質疑的是王懋竑，不過其也只是在《考異》中提到。[41]據統計自宋代至今，

38 據朱子〈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一文，可知朱子一開始合刊《四書》即稱「四子」。

39 稱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四先生為四子者，如茅星來：「愚按學者固不可取足於此，其實四子書中切當精妙處已盡於朱子所纂取，然不讀全書亦不知朱子纂取之精」。參見清・茅星來，〈近思錄原序〉，《近思錄集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a。又如郭嵩燾云：「（題識三）深味《近思錄》所以分章之義，儘看得大，所錄四子之言，亦多是從大處說。……（題識四）朱子輯《近思錄》，四子微言大義，備具其中」。參見清・郭嵩燾，〈卷端題識〉，《近思錄注》，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11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1。錢穆也曾云：「周、張、二程同稱四子，同列為北宋理學大宗。」參見錢穆，〈附述近思錄〉，《朱子新學案（三）》，《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第 13 冊，頁 173。

40 宋・李方子原編，明・李默，朱河訂，《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卷 1，《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5 冊，頁 16a。其他年譜均載錄此文，或云：「於學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參見清・朱玉，《朱文公年譜事實》，卷 2，《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5 冊，頁 13a。或云：「朱子常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參見清・朱烈，《紫陽朱夫子年譜》，卷 1，《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6 冊，頁 14a。

41 清・王懋竑纂訂，《朱子年譜》，卷 2，《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8 冊，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朱子修年譜的著作達五十餘種，[42]所以李方子對陳淳這句話的傳播影響甚大。這部分是過去研究者在討論黃榦、陳淳爭議時較少關注的地方。

三類著作中，在重刊《近思錄》或為《近思錄》批註、續補的相關序跋，則明顯反映出爾等對「四子」的不同理解。根據後世著作的引用與學者的解讀，可分為四類。

### （一）以四子為《四書》

持此觀點的人最多。

1. 葉采（?-?）[43]〈近思錄集解序〉云：

> 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44]

葉采將《近思錄》與四子（《四書》）並列，云二書皆有益後學，可為傳世經典。並論為學次第，應由近至遠，先從《近思錄》始，後及《四書》、六經。

2. 高攀龍（1562-1626）[45]云：

> 以周、程、張、朱為《四書》之階梯，以《四書》為五經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46]

---

1a。清・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卷 2，《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8 冊，頁 1b。

42 尹波，〈宋元時期朱子年譜述錄〉，《朱子學刊》2007 年第 1 輯，總第 17 輯（2008 年 6 月），頁 95。

43 葉賀孫（1167-1237）之子，福建建陽人。從學於蔡淵（1156-1236）、李方子、陳淳。

44 宋・葉采，〈近思錄集解序〉，《近思錄集解》，卷 1，《續修四庫全書》第 9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元刻明修本影印），頁 1a-頁 1b。

45 江蘇無錫人。

46 明・高攀龍，〈崇正學辟異說〉，《高子遺書》，卷 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4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朱子曰：《四書》為五經之階梯，《近思錄》為《四書》之階梯。言所由以從入之序也。[47]

此處直書《四書》之名，於是可知其意。然而高氏既有以「四子」為《四書》之文，亦有以「四子」指北宋四子的文例。另外在《崇正學辟異說》中又以周、二程、張、朱五人替換「近思錄」之名，將「朱子」併入讀《四書》之前的初學人選之一。

3. 張伯行（1651-1725）[48]〈續近思錄序〉云：

> 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要皆倣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續近思錄》，不尤為學者一大憾事……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49]

張伯行雖曾稱周敦頤、程顥（1032-1085）、程頤、張載為四子，四子著作稱四子書。但看張伯行〈近思錄集解序〉云：

> 朱子亦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者也。……故六經、《四子》而外，每於濂、洛、關、閩四氏之書，加意振興，以宏教育。[50]

張伯行將周、張、二程四氏之書與六經、《四子》區別，故知其解階梯說之「四子」為《四書》。

以「四子」為《四書》者較多，本文僅舉數例，其他不再列舉。[51]

---

47 明・高攀龍，〈重鍥近思錄序〉，《高子遺書》，卷 9，頁 6a。

48 河南儀封人，曾任福建巡撫，建鼇峰書院，刊刻《正誼堂叢書》。

49 清・張伯行，〈續近思錄序〉，《續近思錄》（福州：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同治 9 年福州正誼書院續刊本），頁 1a-頁 2b。

50 清・張伯行，〈原序〉，《近思錄集解》（福州：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同治 5 年州正誼書院刊本），頁 1a-頁 2a。

51 以「四子」為《四書》者，尚有李光地（1642-1718）：「讀書以窮經為本，以明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以四子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位北宋先儒

1. 馬恒謙（?-?）〈近思續錄序〉云：

---

為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闊而辭義簡奧，故必以《學》、《庸》、《語》、《孟》為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為之門戶。……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參見清・李光地，〈課王生仲退〉，《榕村全集》，卷 21，《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元年刻本影印），頁 17a-18b。施元勳（?-?）：「朱子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參見清・施元勳，〈北溪字義序〉，宋・陳淳著，熊國禎等點校，《北溪字義》，頁 92。江永（1681-1762）：「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參見清・江永，〈近思錄集註序〉，《近思錄集註》（劍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道光重刊本），頁 1b。汪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由五子而階梯《四子》、六經。」參見清・汪佑，〈五子近思錄原序〉，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8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1。施璜（?-1706）：「嘗謂學者曰：『《四書》者，五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書》之階梯。』」參見清・施璜，〈五子近思錄發明序〉，清・施璜著，李慧玲點校，《五子近思錄發明》，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8 冊，頁 1。清・陳舜錫（?-?）：「朱子有言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欲從事於《四子》，以漸達六經者，不可不自《近思錄》始也。」參見清・陳舜錫〈近思續錄跋〉，清・劉源淶，《近思續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 17 年補刻本），頁 1a。陳舜錫為劉源淶門人，同為劉氏門人的馬恒謙對「四子」理解與陳舜錫不同，其理解「四子」為北宋四子。王鼎（1768-1842）云：「今科場功令命題，一本五經、四子書，其援引傳說，必以朱子為斷，誠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且曰：『《近思錄》，四子書之階梯；四子書，五經之階梯也。』」參見清・王鼎，〈朱子原訂近思錄序〉，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274-275。何璟（1816-1888）云：「斯《錄》為四書之階梯，江《注》又斯《錄》之階梯也。」參見清・何璟，〈近思錄集註跋〉，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頁 282。應寶時（1821-1890）：「由朱子之言，盡通周、程、張子之道，以上探四子、六經之精奧。」參見清・應寶時，〈近思錄集注跋〉，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頁 281。邵松年（1848-1923）：「諸生讀之，講明切究，身體力行，以為讀四子書之階梯，即以為希賢希聖之階梯。」參見清・邵松年，〈重刻近思錄集注後序〉，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頁 2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朱子嘗謂：「周、程、張子為五經之階梯，《近思錄》為四子之階梯」。[52]

馬恒謙序另云：「宋周、程、張子一時星聚，道統復續，傳之未久，異學混真，幸賴我朱夫子出，闡揚六經，訓註《四書》，彰明奧義，集厥大成」。[53]其尊稱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為子，「四書」以書名稱，則知其「《近思錄》為四子之階梯」之「四子」所指為周、程、張子四位先生。

2. 高全喜云：

> 朱熹後來曾說：「周、二程、張四子是學習六經的階梯，《近思錄》又是學習四子的階梯」。[54]

高全喜言《近思錄》又是」學習四子的階梯，是就前句周、二程、張四子而言，故知其指四子為北宋四子。

3. 方旭東云：

> 對陳淳所錄「《近思錄》，四子之階梯」這句話，可作如下判斷：它是說《近思錄》是周張二程之書的入門讀物，而不是說讀《四書》前當先讀《近思錄》。[55]

此處言「《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之「四子」為周、張、二程。復參見其註解，云：「即便是研究《近思錄》的大家陳榮捷，亦偶失考，將『四子』徑解作《四書》」，[56]於此可知方旭東理解前後句「四子」均為北宋四子。

52 清・馬恒謙，〈近思續錄序〉，清・劉源涤，《近思續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 17 年補刻本），頁 2a。

53 同上註。

54 高全喜，《理心之間——朱熹與陸九淵的理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頁 102。

55 方旭東，〈《近思錄》新論〉，《哲學研究》2008 年第 3 期（2008 年 3 月），頁 80-81。

56 同上註，頁 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三）前句指《四書》，後句指北宋四子

學者將前後兩句「四子」，分別指《四書》與北四子。

1. 李方子、真德秀[57]

前文黃榦寫給李方子的信中提到真德秀刊《近思錄》，在其〈後語〉引用《近思錄》階梯說。另外在《西山讀書記》中也抄錄了李方子《朱子年譜》中關於《近思錄》階梯說的內容，文云：

> 淳熙二年，東萊呂公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號《近思錄》。先生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自此而入也。[58]

單靠此處文字，尚無法判斷「四子」所指為何。倘若參酌李方子在紹熙元年下的內容則可據以判斷，其文云：

> 紹熙元年在潭州刊四經、四子書……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之漸。[59]

此段文字繫在朱子刊《四書》底下，不涉及《近思錄》，純就《四書》與《六經》的關係而論。李方子稱「四子則謂」……「然後及乎六經」，可知「四子則謂」之「四子」即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的《四書》，其義即「《四子》，六經之階梯」（「四子」為《四書》）。《西山讀書記》又引了李方子《朱子事實》，內容提到：

> 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

57 福建浦城人，師從朱子高弟詹體仁（1143-1206），為朱子再傳弟子。

58 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 3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77a-頁 77b。

59 同上註，卷 31，頁 80b、頁 81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60]

文中分兩部分，首先提到使學者先讀《四書》是以窮諸經，此義即「《四子》，六經之階梯」。又云《近思錄》使學者先識門庭得以羽翼四子，此處「四子」指北宋四子，其義即「《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合之而論，李方子與真德秀傾向將此兩句話分別放在兩個語境下來理解，前四子為《四書》，後一段的四子為北宋四子。其中，李方子曾與陳淳與黃榦通信討論此事，最終選擇折衷二說，首先其認同陳淳所錄著這句話為朱子所說，但對這句話的理解卻不完全遵從陳淳的解釋。

2. 李文炤（1672-1735）[61]〈近思錄綱領〉云：

> 《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62]

李文炤將前句「四子」改為「四書」。《四書》是六經之階梯，《近思錄》為北宋四子的階梯。此說將二句分為兩種入學階梯，分別為經學與理學的初學進路。

3. 陳榮捷〈論近思錄〉

引「《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其為「四子」、「六經」注解云：

> 四子：即四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
> 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樂經》早佚。宋儒以《周禮》代之。[63]

60 同上註，卷 31，頁 90a-頁 90b。

61 湖南善化人，經學家，曾任嶽麓書院山長。

62 清・李文炤，〈近思錄綱領〉，《近思錄集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 4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據清康熙 59 年刻本影印），頁 1a。

63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3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近思錄詳註集評》、《朱學論集》二書亦引到這段話：

> 朱子云：「四子（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64]
> 朱子嘗云：「四子（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65]

兩書於前句「四子」之下標注《四書》，後句則未注，或省略或另有所指不得而知。參見另一段文字：

> 朱子以大公至正之態度，採選只六百二十二條，而竟能代表理學之全部，無怪為四子之階。[66]

陳榮捷此處言採選六百二十二條代表北宋四子全部的理學思想，則其以《近思錄》為北宋四子之階梯。若此，其對「《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的「四子」應指北宋四子。

4. 程水龍云：

> 「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意思是說：「四書」是學習「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是探究北宋四子周、二程、張的階梯。關於五經、四書、四子著作之間的位次，朱熹認為四書的地位高於北宋諸子著作；五經的地位又高於四書。讀經治學應當由《近思錄》上升到四子，再由北宋諸子著作上升到四書，後由四書上升到五經。[67]

程水龍以前後「四子」分別指《四書》與北宋四子。不過其與李文炤不同，並未作為兩種入學階梯，其指出北宋四子與《四書》間存在由「北宋諸子著作上升到四書」的階段。程氏以朱子〈近思錄序〉云：「得其門而入……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為據，先以《近思錄》進入北宋四子之門，入門後續學周子、

64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2。
65 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124。
66 同上註，頁 128。
67 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程子、張子之書，之後便可繼續讀《四書》、五經。故強調除《近思錄》之外，還須全面的從北宋四子的著作來充實基礎，才得以進入《四書》。

### （四）根據對象來解釋：朱子言「四子」指周張二程，陳淳指《四書》

許家星云：

> 「《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如為朱子之言，則「四子」當指周張二程四子；如為陳淳之言，則當指《四書》。[68]

許家星提出一種別於前人的解釋，其認為要根據對象來解釋「四子」的內涵。若以朱子為作者，「四子」指北宋四子，若以陳淳為作者則「四子」指《四書》。依據的理由為：

> 通過《近思錄》有關《四書》之說與朱子《論孟精義》、《四書集注》說相較，可見《近思錄》關乎《四書》者約 158 條，僅占全書 622 條之四分之一……就其所涉《四書》範圍來看，實不足以為階梯。[69]

許氏從《近思錄》裡談到《四書》的條目較少，說明二者不具備階梯關係。

不過，朱子強調北宋四子之所以能繼承孔孟聖學，關鍵在於方法進路有別於秦漢以來的儒者。因此，從所關涉條目來判斷《近思錄》能否成為《四書》之階梯，恐非允洽之比。

以上諸說均引了陳淳所錄的話，說明基本接受這段文字所提的階梯說。差別在於「四子」所指為何，以及對階梯說為一路（《近思錄》—《四書》—六經），或為二路（《四書》—六經；《近思錄》—北宋四子）的理解不同。若是一路，不論「四子」為《四書》或北宋四子，最終都以上達六經為目的，則《近思錄》仍是唯一的初學之書。若是二路，以《近思錄》上接北宋四子，是理學之階梯；《四書》上達六經，為經學階梯。雖然《近思錄》與《四書》分屬不同體系，但皆可謂是初學入門之階梯。

68 許家星，《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頁 524。

69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四、上達六經的門徑

以《大學》為初學入道之書，或以《近思錄》為階梯，僅憑弟子所記語錄與相關書信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即使後世學者屢屢引用但不代表黃榦的疑問得到解答。欲解決此問題應釐清輯錄與記錄間的差異，並進一步歸納朱子著作中關於初學入道的觀點，如此或能解開此一爭議已久的難題。

首先朱子以《大學》為初學之書，在弟子記錄中條目最多。如：

>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卻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70]
>
>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71]
>
>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72]

這些都是弟子記錄朱子的語錄，以《大學》為先最為清楚，後來朱門弟子也多承繼此說。然而以《大學》為先並非朱子首倡，程頤已如此說。見朱子引程夫子語云：

>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昔[73]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

70 宋・朱熹，〈力行〉，《朱子語類》，卷 13，《新訂朱子全書》第 15 冊，頁 442。
71 宋・朱熹，〈綱領〉，《朱子語類》，卷 14，《新訂朱子全書》第 15 冊，頁 451。
72 同上註。
73 「昔」，一本作「悉」。參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2，《新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74]

其中，朱子對《大學》排序於前沒有異議，僅對程頤將《中庸》置於《孟子》之前的排序有疑義。朱子云：「《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75]認為讀書應由易而難，故《孟子》應置於《中庸》之前，次第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從上述程夫子教人確實可看出《四書》及於六經的說法。再看其弟子楊時（1053-1135）《二程粹言》，亦記有《論》、《孟》先於五經之說，云：

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76]

楊時從二程學，其說自當有所本。復論及讀《論語》、《孟子》與《春秋》的先後關係，亦復如是。其云：

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為先。[77]

《二程遺書》亦有先《論》、《孟》，後《春秋》的說法，如云：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個義理，方可看《春秋》。[78]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

朱子全書》第 25 冊，頁 3895。

74 宋・朱熹，〈書臨漳所刊四子後〉，《晦菴先生文集》，卷 82，頁 34a-頁 35a。

75 同上註，頁 35 a。

76 宋・程顥、程頤，〈論書篇〉，宋・楊時編，清・張伯行重訂，《二程粹言》（福州：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同治 5 年福州正誼書院刊本），卷上，頁 42a。

77 同上註，頁 36a-頁 37a。

78 宋・程顥、程頤著，宋・李籲、呂大臨輯錄，宋・朱熹編定，嚴佐之校點，《程氏遺書》，卷 15，《新訂朱子全書》第 30 冊，頁 2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此觀他經甚省力。[79]

幾處說法既可見其師承關係，亦可見從語錄中由弟子記錄師說以傳承其學的模式。以此回過來看陳淳記錄朱子教學的語錄。朱子或許是用自己的話傳述程子之意，或是將程子的意思進一步明確化作為教導陳淳的內容。此種方式與「輯錄」不同。比如朱子編《近思錄》，輯錄北宋四子著作菁華彙集成書，基本上是原文摘錄，略有增減而已。[80]「記錄」則是用自己的話來敘述記錄他者的言行事蹟，所錄文字並未要求為傳主原封不動之話語或文字。語錄之類多憑回憶記錄，加上語錄不會詳細記載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相關語境，所以常會有對發生時間的猜想與理解上的歧義，或是因為門人理解不同，形成記錄的師說有所差異。

同時朱子曾多次提及先《四書》後五經的說法，這是源於朱子自己的讀書經驗，其云：

> 《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81]
>
> 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82]
>
>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83]

79 同上註，卷 18，頁 269。

80 陳榮捷云：「《近思錄》之採引原文，每有增減，然皆為行文之便，與原意並無出入……改削字句而於意義有所影響者，只此一處。且此又為間接暗示而已。」參見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頁 126-127。

81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5，《新訂朱子全書》第 19 冊，頁 3903。

82 宋・朱熹，〈與陳丞相別紙〉，《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26，《新訂朱子全書》第 22 冊，頁 1180。

83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7，《新訂朱子全書》第 17 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上述引文可證，朱子確實有提過「四子，六經之階梯」的說法。石立善曾直指朱子「《四子》，六經之階梯」這段話的思想是出自二程。[84]大抵讀經之前，先從《四書》讀起，可獲事半功倍之效。以此回過去看黃榦對陳淳的質疑之一，從「輯錄」的立場言「不見朱先生有此語」，來否定階梯說出自朱子。然而若由「記錄」的角度來理解未見朱子有相同文字，便不一定表示陳淳記錄的內容就必定「非先生之意」。

彼此意見分歧的主要爭議點是陳淳所錄「《近思錄》，四子之階梯」這句話。《近思錄》之所以須先於《四書》，不是文字上的問題而是讀書方法，所謂讀《四書》不是唯讀經書本文，更不是從漢唐注疏看起，朱子云：

> 《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下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先儒一字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85]

朱子認為前儒不解聖人本意，所注所疏往往穿鑿，為了重新理解孔子等聖賢的本意，其云：「某因將《孟子》反復熟讀，每一段三五十過，至此方看得出」，經過這樣反復閱讀的過程提出對經典的解釋，同時繼承二程以來從理學解釋經典的方法。[86]因此《四書》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其文本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朱子提出讀《四書》的方法，所以讀《四書》得從《近思錄》或與《近思錄》採取相同讀書方式的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讀起。

舉例來說，孟子（前 372-前 289）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趙岐（?-201）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孫奭（962-1033）疏：「孟

---

頁 2392。

84 石立善，〈朱子所謂「四子」何指——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衡水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61。

85 宋・朱熹，〈答呂子約〉，《晦菴先生文集》，卷 48，頁 13a-頁 14a。

86 案朱熹於〈答陳明仲〉中有更為明確的表達：「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參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新訂朱子全書》第 23 冊，頁 19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者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87]朱子較趙岐、孫奭更注意「心」的作用，其云：「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88]這是人的心本合乎天的理，二者無異。天既然有生物仁愛之心，那麼人的本性也就有生物仁愛之心。其不僅從章句訓詁的方式來解經，更將不忍人之心的原因揭示出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其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89]將心統性（仁）、情（惻隱）的關係解釋的怡然理順。這樣的讀法是用生命體會，並持續不斷的深求玩味，最終趨近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聖域，此正是《近思錄》中得見的，也是朱子要初學者注意的讀書方法。

陳淳如此用心記錄傳承師說，自然不可能是為了自己立說，若有不解其意而誤會者，恐陷陳淳於不義。如許家星云：

> 故以《近思錄》為《四書》階梯，當是北溪早年之見，實非朱子之意。
>
> 陳淳「階梯論」明顯有事後個人推論的痕跡……以《近思錄》為《四書》階梯，是陳淳學道之見，斷非朱子之言，陳淳有意借朱子為旗幟來表達自身看法，這在記錄體中應非少見。[90]

此說雖然提出新的學術觀點，不過若參照朱子告誡陳淳的信，信中呈現對陳淳品性的看法，便與所論不太相應。朱子告陳淳云：「須出來行一遭，村裡坐不覺壞了人」。可知陳淳多居家閉門讀書，鮮少與人往來，既便困貧卻從未汲汲名利。或如黃榦雖不同意陳淳所錄，也僅提出不知何所據云云耳，並未揣測其

87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據阮元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卷 3 下，頁 7b-頁 8a。

88 宋・朱熹，〈公孫丑章句上〉，《四書章句集註》，卷 3，《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宋嘉定 10 年當塗郡齋刻嘉熙 4 年淳佑 8 年 12 年遞修本影印），頁 31a。

89 同上註，卷 3，頁 33b。

90 許家星，《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頁 524、536、5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意。又《宋史》云：「淳性孝……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再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淳於朱門弟子之中，最為篤實」，上述若非溢美之詞，當有參考價值。胡適（1891-1962）也曾贊陳淳所錄「記錄最小心，最用功，最能表現朱子說話的神氣，是最可寶貴的史料」。[91]是以言陳淳欲借朱子為旗幟闡揚自己的學術理念，若非有十分證據驟下此斷語，北溪先生何辜！

另外，蘇費翔提到：

> 朱熹對《近思錄》的態度未必有變，但是他似乎給不同的門人不同的教導，正如孔子因人施教之法。陳淳初見朱熹，他對《近思錄》的熱情很有可能使朱熹十分感動，因此朱熹對他說「《近思錄》，《四書》之階梯」一句來鼓勵陳淳研讀《四書》，繼續從事道學的學業。但是這一句話是針對陳淳的，而不是要每個初學者必讀《近思錄》再攻《四書》。[92]

此雖亦提供一種思考。不過以陳淳與朱子的關係，陳淳下筆時難道分不清楚老師所言是普遍性還是針對性的話，若僅是對陳淳所說的鼓勵語，陳淳會將之記錄呈交上去，並如此慎重其事的闡述其意義嗎？

就此而論，朱子雖提過《近思錄》作為北宋四子之入門階梯，在其編輯《近思錄》的語境下也可以成立。不過不應將《近思錄》之階梯局限於此，當知陳淳所錄的這段話是朱子指導上達六經的途徑。因此確認朱子著作中有《四書》為六經階梯，《近思錄》為《四書》之階梯的意思，那麼就可作為陳淳所錄階梯說的佐證，進而理解朱子從《近思錄》至《四書》，繼以上達六經的門徑，此乃一路階梯，不可將之分別為兩路來理解。

## 五、入學入道階梯

陳淳之說既然清楚，為何後世學者仍產生不同的理解。原因在於不論《大學》或《近思錄》，二書都具備作為初學之書的條件。比如《大學》作為一本指導初學的著作，其將為學次第清楚且系統地展開，因此非常適合作為初學入

91 胡適，〈朱子語類的歷史〉，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第 6 冊，頁 2115。

92 蘇費翔，〈《近思錄》《四書》之階梯〉，陳來主編，《哲學與時代，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5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門的初讀書。而《近思錄》的重要性在於其不僅彙整了北宋四子的理學思想，同時朱子認為他們接續了孔孟不傳心訣，因此要入道必須從北宋四子掌握起。黃榦堅持從二程以《大學》為先的傳統，不過其不會不知道朱子教人如何讀《大學》的方法。陳淳也認同以《大學》為初讀之書，只是不能不把朱子提點過他當以北宋四子的方式來讀《大學》的教誨忠實地記錄下來，這就是《近思錄》作為《四書》之階梯的原因。

就此而論，《大學》教的是為學次第，《近思錄》教的是入道。一本是教人入學之書，一本是教人入道之書，該以何為先？人之所見，未必盡同。就陳淳當時理解朱子的意思，在北宋四子之前人們雖然也讀了《大學》，但並未真正理解聖人本意，所以光知道為學次第是不夠的，人們必須理解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道，才能把「學」融入生命，這才是趨向聖人之道的次第。如程子云：「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93]因此《近思錄》當為初學入門之第一書。

程子以《大學》教人，是因為他們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必然是朱子所云見聖道的方式，所以表面上北宋四子以《大學》為先，但不可忽略了他們是如何理解《大學》的，這便是朱子編《二程遺書》、《近思錄》的原因。同理，黃榦在〈朱子行狀〉提到先《四書》而後六經，並將謂此為「入道之序」。蓋入道者，入聖人之道，不僅需要為學次第，亦須入道方法，具此二者方是入道之序。若不加說明容易產生誤解，或以為《四書》即為朱子所謂入道之序。[94]實則《四書》乃入學之書，北宋四子上承孔孟心訣乃入道之法，以入道之法讀入學之書，方可入道。若讀《四書》即是入道之序，何以北宋四子之前聖學斷矣。

即便如此，《近思錄》作為初讀書在朱子在世之時即有爭議，不少提到《近思錄》難看的問題，[95]或因為難讀，所以學者認為朱子、陳淳、真德秀等晚年不再強調《近思錄》，論學教人時也鮮少提到，似乎更重視《四書章句集注》。比如真德秀云：

93 轉引自宋・朱熹，〈讀論語孟子法〉，《四書章句集註》，頁 1a。

94 李紀祥認為黃榦以《四書》即是入道之序。其云：「黃榦在此表述四子書的次序時，用的語言是入道之序……此讀書之序同時也就是入道之序」，參見李紀祥，〈入道之序，由「陳（淳）、黃（榦）之歧」到李滉《聖學十圖》〉，《道學與儒林》，頁 79。

95 葉賀孫記：「《近思錄》又難看」。宋・朱熹，〈論自注書・近思錄〉，《朱子語類》，卷 105，《新訂朱子全書》第 18 冊，頁 37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深達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96]

這裡不僅是從《近思錄》轉向重視《四書章句集注》的問題，更重要的這裡很容易將真德秀的說法理解成先《四書》後《近思錄》，而此說恰與陳淳所錄相反。但稍加辨別便可知這裡雖云「四書」，不過行文稱「文公」，表示寫於朱子歿後，故《四書》指《四書章句集注》。所以真德秀並非認為《四書》先於《近思錄》，而是另外提出以《四書章句集注》作為《近思錄》階梯的說法。

關於《四書章句集注》與《近思錄》孰先孰後也有不同看法。比如戴家禧（?-?）曾云：

> 讀周、程、張、朱之全書，而胸有繩約，而不患其浩瀚，於以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注》。[97]

又如李紀祥在說明「近思錄→四書→五經」進入聖學的學習階序時，云：

> 由《近思錄》而《四書章句集注》，由《四書章句集注》而五經聖人之學。[98]

戴家禧、李紀祥均認為《近思錄》階梯說乃是針對《四書章句集注》而言。不過《四書章句集注》的內容實已採用北宋四子的心訣進行書寫，[99]從內涵來說

96 宋・真德秀，〈問太極中庸之義〉，《西山文集》，卷 3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5b。

97 清・戴家禧，〈北溪字義序〉，宋・陳淳，《北溪字義》，頁 95。

98 李紀祥，〈入道之序，由「陳（淳）、黃（幹）之歧」到李滉《聖學十圖》〉，《道學與儒林》，頁 83。另外該篇論文他處亦可見將「四子」（《四書》）指《四書章句集注》的說法，如云：「《近思錄》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103。李紀祥認為《近思錄》代表理學，六經是聖學，陳淳提出的階梯說可以將聖學與理學的斷絕使之復續，此正是朱子模糊未清楚表述的地方。此間斷絕必待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而能貫通。

99 陳淳云：「吾先生所以發明《四書》之宏綱大義者，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參見宋・陳淳，〈書李推近思錄跋後〉，《北溪大全集》，卷 14，頁 7a-頁 8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思錄》與《四書章句集注》是同性質的著作，二書不當有階梯順序之別，所以《近思錄》階梯說當是針對古《四書》文本，非指《四書章句集注》，如此亦可解釋為何真德秀晚年欲以《四書章句集注》作為《近思錄》的階梯，因為《四書章句集注》乃集入學入道於一的著作。

另外一個問題，真德秀、陳淳等晚年較少提到《近思錄》，對於此情況，不少學者認為朱子晚年的《四書章句集注》可以取代《近思錄》。比如蘇費翔云：

> 陳淳終於發現，讀《四書》比讀《近思錄》更為切要。對他個人而言，《近思錄》仍為《四書》之階梯，而且道學學派包括朱熹曾經很需要《近思錄》，才能真正體會到古代聖賢的思想。但是他最後還是承認，既然朱熹已經出了《四書章句》，一般學士再不需要《近思錄》當作「《四書》之階梯」了。[100]

蘇氏提到陳淳晚年欲以《四書章句集注》取代《近思錄》。[101]意謂原本藉由北宋四子進入《四書》的方法在《四書章句集注》已經體現，所以可以取而代之，作為最開始的應讀之書。

又有學者提出弟子特意強調《四書章句集注》的重要性，比如許家星認為從內容檢視《近思錄》不足以為《四書》的階梯，其云：「《近思錄》在質、量兩方面皆與《四書集注》關係不大，且《集注》收入了大量與《近思錄》無關，而見於《論孟精義》、《中庸輯略》的二程後學之說」。[102]不過這種說法也不盡然可以切斷《近思錄》與《四書》間的關係。因為《近思錄》作為古《四書》本文的階梯，主要是從朱子摘錄北宋四子的讀書方法，藉以進入《四書》。若定要將《近思錄》的內容與《四書章句集注》比較，說明彼此關係遠，那麼

100 蘇費翔，〈《近思錄》《四書》之階梯〉，頁 508。

101 蘇費翔注意到此處真德秀的說法與《西山讀書記》以《近思錄》為先的說法不同。認為真德秀撰《西山讀書記》重點是廣收資料，書中言語未必皆是真德秀自己會支持的觀念，有時只是做一些記錄當參考而已。這段引文出於真氏親著問答，因此較為可信。據此推測真德秀似乎沒有熱烈地支持陳淳的立場，或是其看法一生有變化。同上註，頁 506。案《西山讀書記》中真德秀云：「按李方子為文公年譜，今剟其要附此」，可知涉及《近思錄》的部分抄錄自李方子《朱子年譜》及《朱子事實》。參見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 31，頁 72a-頁 73a。

102 許家星，《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頁 5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何解釋《四書》與六經間的差異，畢竟《四書》與六經文本間的差距更大。所以不應局限在內容上，而是理解朱子是借鑒北宋四子的方式進入《四書》。許氏又云若視《近思錄》為《集注》之階梯實質上削弱了《集注》的重要性，降低了朱子在道統中的地位。朱子成就《集注》一書，實有以此書為道統根本所在而優先於《近思錄》之意。[103]再如蘇費翔云：

> 在 13 世紀初，陸九淵學派在浙江一帶越來越有影響力，造成朱熹思想有很大的挑戰。陳淳為了遏止這樣的發展，有可能感到支持朱子學的必要性。《近思錄》為北宋諸儒的言錄，比較不適合達到這個目標，而《四書章句》自然可以用來提高朱熹的地位。[104]

許氏與蘇氏的看法似乎認為道統與地位可被弟子特意凸出一本著作的價值所影響，所以弟子們紛紛強調《四書章句集注》的重要性高於《近思錄》。事實上，《近思錄》在後來的影響非但沒有減小，反而成為理學經典的代表著作。這說明或許部分學者認為《四書章句集注》比《近思錄》更為成熟，[105]但《近思錄》在後世傳播中重未被淘汰或取代。

綜上所論，《近思錄》在相應對象上既可以作為北宋四子的階梯，也可以作為《四書》的階梯。陳淳在表述中未將《近思錄》作為入道與《大學》作為入學次第加以區別，致使無法清楚說明二者的矛盾該如何解決。若能釐清《大學》乃入學之書，《近思錄》為入道之書，《四書章句集注》是集入學入道之書，那麼或可避免後世學者的困惑。

## 六、清代學術風氣轉變
## 對《近思錄》階梯說的影響

宋代理學經過明代推波助瀾，成為宋明之際的學術主流。不過明代中葉之後不少以考據名家的學者漸嶄露頭角，如梅鷟（1483-1553）、楊慎（1488-1559）、

103 同上註，頁 537。

104 蘇費翔，〈《近思錄》《四書》之階梯〉，頁 508。

105 嚴佐之：「雖說朱子自以為此錄詳於義理精微，堪稱四子之階梯，但《近思錄》畢竟還算不上朱子最用力，最重視的撰著。至少不能與其臨終仍念念不忘的《四書章句集注》相提並論。」參見嚴佐之，〈《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序〉，程水龍，《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耀文（約 1523-1619）、焦竑（1540-1620）、陳第（1541-1617）、胡應麟（1551-1602）、周嬰（約 1583-1651）、方以智（1611-1671）等成果蔚然可觀。[106] 同時，因為明代亡於異族，故清初多以陽明後學做為反省起點。復經閻若璩（1636-1704）、惠棟（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著名學者引領，使考證學漸能與宋學保持對峙。乾隆（1711-1799）上位之初曾對惟據漢唐箋疏而不講程朱理學的說經者提出不可偏廢的要求，其云：

> 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為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為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107]

不過自乾隆開始修《四庫全書》後遂不斷偏向漢學。如《四庫全書總目》云：「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108]主要批評部分宋儒空談性理無實證的治學態度，力圖恢復漢代以章句訓詁言必有證的治經方法。最終定調以崇漢抑宋為宗旨，此謂之為清代學術風氣之轉向亦未嘗不可。正如夏長樸云：

> 漢、宋爭執的源頭，其實來自於較早的《四庫全書總目》。此書雖標榜在漢、宋之間，「參稽眾說，務取持平」，以求「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但其內容「崇漢抑宋」的觀點顯而易見，眾所周知。[109]

106 參見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107 清・乾隆，〈訓諸臣研精理學諭〉，《高宗實錄》，卷 128，《清實錄》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據大紅綾本影印），頁 875-876。

108 清・永瑢、紀昀等，〈孝經問提要〉，卷 32，《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間武英殿刊嘉慶間後印本影印），頁 17a-18a。

109 夏長樸，〈序〉，《四庫全書總目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樣的環境下，批評宋學的聲音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強烈。《近思錄》階梯說一方面受到《四書章句集注》的挑戰，一方面也受到清代學術風氣轉變的影響，比如明代官方所編的三書，《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可以視為這種「學階」論調下的反映。[110]至清代新刻《近思錄》集註等著作時，部分序跋已不再提階梯說，如李承端（?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舉人，江西婺源人）〈近思錄集注跋〉、先福（17??-1821）〈重刻近思錄序〉、張日晸（1791-1850）〈重刊近思錄集注序〉、孫鏘鳴（1817-1901）〈朱子原訂近思錄跋〉、吳棠（1813-1876）〈朱子原訂近思錄跋〉、茅星來（1678-1748）《近思錄集註》、郭嵩燾（1818-1891）《近思錄注》、呂永輝（1839-1921）《國朝近思錄》等，序跋裡都不再引用「《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一句。說明爾等對這句話的重視不如以往，重刻僅表示《近思錄》是學習程朱理學最重要的基礎。據統計清代《近思錄》研究著作達四十餘種，[111]數量超過《四書章句集注》的相關研究著作。

另一方面則是提出過去未曾提到可作為《四書章句集注》、《近思錄》階梯的初學著作，如施元勳刊陳淳《北溪字義》云：「願今之讀《章句集注》者，以是為階梯爾」。[112]施氏提出了一個新的為學次第，認為陳淳此書薈萃周、程、張子之緒言成語，折衷於所聞之師說，與夫《章句集注》之精意，觸類引申，貫穿洞達，俾覽者源流本末瞭若指掌，燦如列眉。[113]可作為《四書章句集注》之階梯。或如江永（1681-1762）著《近思錄集注》云：「竊謂此《錄》既為《四子》之階梯，則此《注》又當為此《錄》之牡鑰。」[114]欲以自己的著作作為打開《近思錄》之鑰匙等。

再有一方面，是標榜新的入學之道，如戴震云：「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115]王念孫（1744-1832）云：「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116]提出以小學作為經學的階梯。又如張之洞（1837-1909）

110 參見李紀祥，〈入道之序，由「陳（淳）、黃（榦）之歧」到李滉《聖學十圖》〉，《道學與儒林》，頁 86。

111 嚴佐之，〈《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序〉，程水龍，《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頁 2。

112 清・施元勳撰，〈北溪字義序〉，宋・陳淳，《北溪字義》，頁 92。

113 同上註。

114 清・江永，〈近思錄集註序〉，《近思錄集註》，頁 2a。

115 清・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東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經韵樓刊本影印），卷 11，頁 9a-頁 10a。

116 清・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北京：中國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云：「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117]也是呼應此一觀點。

近代學者論此議題不似過去存在切身關係，因此能更客觀的看待入道之序的問題，不過也因為非關切身問題，所以對於此議題的體會不如古人深切。比如黃珅在點校劉源涤《近思續錄》的點校說明中云：「不管朱熹是否說過『近思，四子之階梯』這樣的話……」。[118]似乎表達出不甚在意朱子是否說過這句話。前人之所以重視初學入道之書，是因為此將影響聖學的追求，所以朱子窮盡一生加上門人弟子後學的努力，最終完成《四書》、《五經》的學習順序，對於古人而言這當然是重要的問題。而以「《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為次第，則是進一步將理學作為經學的階梯，這涉及漢唐以來以注疏所代表的經學傳統，其難度更高。畢竟《四書》仍是聖賢所傳，而《近思錄》僅是摘錄北宋四子的著作。這樣試圖改變時代的學術工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比如清代要將宋學轉向漢學，得靠朝廷與學者歷經數十年的時間才能慢慢落實。夏長樸云：

> 在編纂這部書籍的過程中，四庫館臣如何經由撰寫、修改、抽換等方式聚焦原本錯綜複雜各自分歧的提要內容，建構出「漢宋對峙」這個主旨鮮明完整的核心觀點，再充分運用此一觀念，分析處理歷代學術的發展，以期達到主導學術解釋權的目的，進而完成先秦以來「一道德，同風俗」的終極理想。[119]

涉及這麼龐大的學術改造工程，便不會僅是為了修訂文獻上的文字，或是爭孰先孰後的問題，其目的是建立新的知識系統，此將對往後的學術與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改變的是，即使對宋學仍保持高度敬意的學者，當他們在重刊《近思錄》並加以傳播的同時，他們的入學之道亦已非遵循朱子的階梯說，更多的當作進入宋代理學的基礎。使得本來佔據儒學中心的程朱之學，退居成為儒

---

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經韵樓刻本），頁 1b。

117 清・張之洞，〈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清・張之洞著，范希增補正，《書目答問補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303。

118 黃珅，〈點校說明〉。參見清・劉源涤，《近思續錄》，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10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1。

119 夏長樸，〈朝向一個學術史觀的建構——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為例〉，《中國經學》第 28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頁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宋明理學。如錢穆（1895-1990）云：「後人治宋代理學，無不首讀《近思錄》」，[120]《近思錄》從為學入道的階梯，變成理學的階梯。

## 七、結語

《朱子語錄》以記錄朱子平生與弟子的教學講話為主。陳淳記「《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一則，以朱子憂孔孟道學不傳故編輯《近思錄》，說明北宋四子繼往聖絕學的意義，使學子能循序漸進地向《四書》、六經完成聖人之道的學習。

這則語錄一開始在黃榦與陳淳的爭議中牽涉的是真偽問題，雖然黃榦有過質疑卻無法阻止其在朱子後學中流傳。從《朱子語錄》、《朱子年譜》、《近思錄》序跋的引用，可以看出後世學者基本接受了這句話。但對「四子」究竟指北宋四子或孔、曾、思、孟的《四書》並未有一致的看法。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因為朱子曾經提過以《近思錄》作為初學入門之書，說《近思錄》足以得其門而入。另一方面朱子也曾舉程頤教人以《大學》為先之說，以《四書》為初學之書。若將兩種說法放在一起，便產生矛盾。實則程頤讀《四書》非以漢唐章句訓詁為主的讀書法，是後來所謂程朱理學式的讀法。同理，朱子以《大學》為初讀之書，其所講的非是以漢唐注疏之學來讀《大學》，而是以北宋四子的讀書法為準，這就是編《近思錄》的原因。若無此認識，循著過去的方式讀古《四書》本文，是無法進入聖門的。

檢視陳淳記錄的階梯說能在朱子著作中找到相同意思，加以陳淳對朱子的崇敬態度而言。筆者認為陳淳沒必要杜撰朱子未曾說過的話作為師說，此當是親聞夫子之教才會有此記錄，而且在其耳提面命的過程中必然有當下的語境，所以這句話應最大程度的優先以陳淳的解釋為第一義。

綜上所論，諸書條目綱領莫如《大學》，而欲解孔孟不傳之秘旨，當從北宋四子為鎖鑰方得以窺測其蘊。從基礎來說，《大學》是初學入門之書；從方法而言，《近思錄》是入道之書，而《四書章句集注》則是朱子以北宋四子讀書法闡釋《四書》的具體成果，可謂集入學入道於一的經典著作。[121]當然，這

120 錢穆，〈朱子對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四人之稱述〉，《朱子新學案（三）》，《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第 13 冊，頁 65。

121 參考詹秉叡，〈解經系譜與主體之建構——再探朱熹集結《四書》之立意〉，《成大中文學報》第 71 期（2020 年 12 月），頁 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樣的區分僅是強調黃榦、陳淳對於這段話理解的重點所在，不表示《大學》沒有入道的引導功能，或《四書》的重要性就低於《近思錄》。如此看方能完整的理解朱子對入道之序的觀點，更能明白《四書章句集注》在承繼聖學上的貢獻與價值。

清代風氣一轉為揚漢抑宋，影響了宋明以來的學術發展，理學從儒學中心退出，被歸為儒學發展的階段之一。將《近思錄》作為理學的階梯，另提出以小學訓詁為經學的階梯。透過梳理《近思錄》階梯說的出現、傳播、影響與退場，也同時反映了宋代以至明清學術思想的變化過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據阮元刻《十三經注疏附挍勘記》本影印。

宋・程顥、程頤著，宋・楊時編，清・張伯行重訂，《二程粹言》，福州：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同治 5 年福州正誼書院刊本。

宋・程顥、程頤著，宋・李籲、呂大臨輯錄、宋・朱熹編定，嚴佐之校點，《程氏遺書》，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新訂朱子全書》第 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宋嘉定 10 年當塗郡齋刻嘉熙 4 年淳祐 8 年 12 年遞修本影印。

———，《晦菴先生文集》，《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據宋刻本影印。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新訂朱子全書》第 15-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新訂朱子全書》第 21-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宋・黃榦，《勉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70 冊，北京：綫裝書局，2004，據明鈔本影印。

———，《北溪字義》，熊國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

宋・李方子原編，明・李默，朱河訂，《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山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黃震，《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正德刊本。

宋・黃仲元，《四如講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葉采，《近思錄集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9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元刻明修本影印。

元・汪克寬，《環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陽思謙修，明・徐敏學、吳維新纂，《萬曆重修泉州府志》，收入劉兆祐主編，《中國史學叢書三編》第 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據明萬曆 40 年刊本影印。

明・黃宗羲原本，清・黃百家纂輯，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明・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3-12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清・王鼎，〈朱子原訂近思錄序〉，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清・何璟，〈近思錄集註跋〉，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清・應寶時，〈近思錄集注跋〉，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清・邵松年，〈重刻近思錄集注後序〉，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9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清・劉源涤，《近思續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 17 年補刻本。

———，《近思續錄》，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10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清・李光地，《榕村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版社，2010，據清乾隆元年刻本影印。

清・張伯行，《近思錄集解》，福州：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同治 5 年福州正誼書院刊本。

———，《續近思錄》，福州：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同治 9 年福州正誼書院續刊本。

清・施璜著，李慧玲點校，《五子近思錄發明》，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8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清・汪佑，《五子近思錄》，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8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清・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朱子年譜》，《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清・李文炤，《近思錄集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 4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據清康熙 59 年刻本影印。

清・江永，《近思錄集註》，劍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道光重刊本。

清・茅星來，《近思錄集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乾隆，《高宗實錄》，《清實錄》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據大紅綾本影印。

清・戴震，《戴東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經韵樓刊本影印。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 20 年經韵樓刻本。

清・永瑢、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間武英殿刊嘉慶間後印本影印。

清・朱玉，《朱文公年譜事實》，《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清・朱烈，《紫陽朱夫子年譜》，《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第 26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清・郭嵩燾，《近思錄注》，嚴佐之等編，《近思錄專輯》第 11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張之洞著，范希增補正，《書目答問補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 二、近人論著

尹波，〈宋元時期朱子年譜述錄〉，《朱子學刊》2007 年第 1 輯，總第 17 輯，2008 年 6 月，頁 95-100。

方旭東，〈《近思錄》新論〉，《哲學研究》2008 年第 3 期，2008 年 3 月，頁 77-84。

王志瑋，《黃榦、陳淳對朱學的繼承與發展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逢源先生指導，2009。

石立善，〈朱子所謂「四子」何指——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衡水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60-63。

李紀祥，《道學與儒林》，臺北：唐山出版社，2004。

李蕙如，《陳淳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4。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20。

———，〈朝向一個學術史觀的建構——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爲例〉，《中國經學》第 28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頁 49-72。

高全喜，《理心之間——朱熹與陸九淵的理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張加才，《詮釋與建構——陳淳與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許家星，《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嚴佐之先生指導，2006。

———，《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詹秉叡，〈解經系譜與主體之建構——再探朱熹集結《四書》之立意〉，《成大中文學報》第 71 期，2020 年 12 月，頁 1-42。

錢穆，《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第 11-15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蘇費翔，〈《近思錄》《四書》之階梯〉，陳來主編，《哲學與時代，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496-5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